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含义与途径

清华大学软件学院 2020010108 徐浩博

摘 要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论断关乎我国经济的发展战略部署的转变，也关乎共同富裕美好愿景的实现。在此，我在充分阅读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相关章节之后，结合自己的一些理解，试图给出习近平总书记这一深刻论述的具体含义以及发展途径。具体来说，我们先从“质”和“量”两个维度诠释了“高质量发展”的含义，又从如何解决“不平衡发展”和“不充分发展”两个角度给出建议。

关键词 高质量发展 中等收入陷阱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五位一体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我们党和国家结合实际对过去的发展做出的总结，同时也是在新时代下对我们的发展之路提出的要求。只有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方才能得以深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方才能实现。但首先，我们需要正确理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含义，其次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内外发展历史和当今发展形势，进行科学研判和周密计划，才能够走好高质量发展这条道路。

**一、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含义**

**（一）“量”的逻辑——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选择**

“齐旧四量:豆、区、釜、钟”，今新之量盖唯GDP、GNI几者矣。GDP、GNP、GNI等指标在范围和统计方法上略有不同，但无论是何者，均可以作为衡量一国一地区发展的重要度量；人均GDP/GNI更是成为世界范围内衡量人民平均收入和生活水平的绝对标准。基于此，世界银行每年都会依据人均GNI划分各个国家和地区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的标准，而2006年提出的“中等收入陷阱”说法也正是根据此标准提出的。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上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100多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只有十几个成功进入高收入经济体”[[1]](#footnote-1)也论述的是这一发展问题。下面让我们着重横向比较一下历史上几个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历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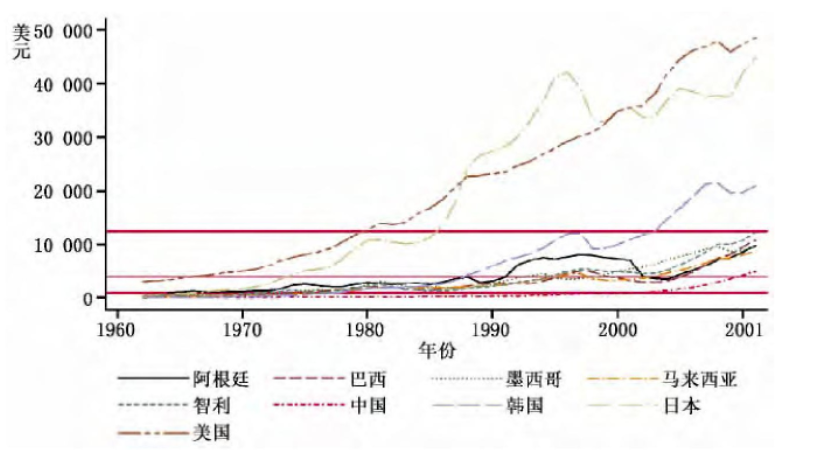


图1：若干国家人均GPI的变化图[[2]](#footnote-2)

由图1可以看到，阿根廷、巴西、智利等南美国家跻身中等收入国家后经济停滞不前，长期徘徊逡巡不前。事实上，不少南美洲国家一开始坐拥人口红利，以巴西为例，巴西人口数量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破一亿，且地处世界上最大的冲积平原——亚马逊平原上，地域广阔，物产丰茂；同时拥有得天独厚的人口优势和自然资源优势。因此，巴西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经历过腾飞时期，平均年GDP增速超10%，被视为发展中国家的奇迹。然而发展到达一定水平：1）在经济结构方面，巴西国内的资源配置失调，过度向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倾斜；2）发展动力不足，发展不平衡扩大贫富差距，国内消费市场萎靡，失去了消费这一重要的发展动力，同时也忽略了科技创新对于提高生产力方面的作用；3）不配套的社会制度，如过度超前的福利政策透支了本来可以成为发展动力的一部分资源；4）政治矛盾冲突，一方面是社会割裂，另一方面是政变反复，均打击了经济发展的可能性。

与之相比，以韩国、日本为首的东亚国家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进行了轻工业向重工业再到高新技术产业的经济结构转变，产业进行及时升级转换；与此同时，恰当的配套社会制度使得国内的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趋于低位，而开放的贸易政策又使得高科技产品的出口转接国内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又一大发展动力，因而在八十年代能够以极高的发展速度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迈入高收入国家的大门。

我国的发展历史有其特点，建国初期，我国就已经建立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后，依靠扎实的工业基础以及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我国经济实现腾飞。如今，我们的经济发展也获得了历史性成就，在全党全国的共同奋斗之下，我国经济实力取得巨大飞跃。然而随着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们已经面临动力缺乏和发展不平衡等诸多问题。有上世纪诸多南美国家的前车之鉴，我们应当深刻意识到“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而我国的经济也理应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也就成为了可持续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质”的逻辑——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质，犹本也”，如果说量描述的是经济发展的数字度量，那么质描述的就是人民需求在本质上以何种程度得以满足。质是难以度量的，不是抽象的，不是唯数字论的，它既是对量这个维度的丰富，也是对量的进一步发展。在人民角度，“质”的追求意味着人民的需求从“数”维度向多种维度的拓展；在国家与社会角度，“质”的追求同时也意味着我们党和国家对于发展中的公平分配、环境保护等诸多有关人民福祉的价值取向上的承诺。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3]](#footnote-3)，从一个方面来说，我们的发展在城乡、地域、社会各个阶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此乃“不平衡”的含义；而另一方面，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意味着我们的发展不仅要满足物质文化需要，更是政治需要、社会需要、生态需要等多方面的日益增长的需要，这些多维度的需要之匮乏乃“不充分”的含义。基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这一论断以及人民日益增长的各种需求，我们的经济发展的价值取向也从单一的高速增长这一“数”的维度拓展到多种“质”的维度上来。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确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提高了人民的收入，同时使得人民的科学教育水平、社会保障水平、物质和精神文化水平、幸福感水平等指标上得到了显著提升，但同时也产生了许多问题。正如十九大报告中所叙述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创新能力不够强……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4]](#footnote-4)。近些年来日益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屡见不鲜：高污染高耗能行业对人民的健康安全造成损害，经济中脱实向虚去工业化等现象造成产业空心化存在隐患，贫富差距问题依然突出，基础公共资源如教育、医疗等的匮乏孳生的上学难、看病难等社会问题仍然存在。而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也要求我们经济进行从高速发展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变。

**（三）“质”与“量”结合——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实质上是对“质”和“量”的有机结合。

在“量”上，稳字当头。十九大报告指出“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挑战十分严峻”[[5]](#footnote-5)。十九大以来，新的困难也接踵而至。从中美贸易战到新冠疫情蔓延，再到俄乌战争爆发深刻影响着国际政治与经济形势；这些无不对我们国家的投资、消费、进出口等经济领域以巨大考验。而经济又无时无刻不与民生紧密相连。因此，稳经济、保增长是党和国家对人民的许诺，是朝着“共同富裕”迈进的必由之路。

在“质”上，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原则。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上首次提出新发展理念，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又再次强调：“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6]](#footnote-6)，从五个维度上概括了发展的导向——我们的发展不是经济结构僵化的失去创新的发展，不是偏废的不协调的发展，不是先污染后治理的不可持续发展，更不是唯数量论拉大贫富差距的畸形发展。“质”确保了每个公民都能在免受经济发展的负外部性的同时，提高生活质量和幸福水平，真正共享发展成果。

与此同时，我们要意识到“质”和“量”的推进并不是冲突的——“量”是“质”的基础，“质”是“量”的发展。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唯有量变才能产生质变，而质变正是量变的最终归宿。因此，在“量”的基础上，我们才能保持着对“质”的追求；而唯有对“质”有着期许，“量”也才有意义。因此，“质”与“量”不可偏废。不能因为追求GDP的增长而盲目牺牲环境破坏公平；也不能因为追求其他方面的发展而放任GDP增长变缓。总之，要做到“质”和“量”的有机结合，共同发展，这样的发展才是“高质量发展”。

**二、解决“不充分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不充分发展要从供给侧解决**

我们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恰是“高质量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首先来思考“发展不充分”问题。“发展不充分”指的是我国部分地域、行业等发展程度较低，经济结构、资源配置等不能满足新时代的发展要求。为此，我们提出，解决发展不充分问题的关键之道在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5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中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强调面对“供给侧”的一系列问题，进行“结构性改革”，调整资源配置，优化制度，从而保证我们的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基于现阶段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问题而提出的。首先，对照南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历程，在发展过程中，许多国家在发展初期因为在短时间内会因为人口、资源、制度红利等优势，加之发展初期的追赶效应，均会出现一段时期的经济蓬勃繁荣。然而，在持续发展的过程中，从内部看，种种优势的效果削弱，经济结构渐渐不符合新的发展阶段，出现经济疲软；从外部看，红利减小也导致进出口亟待转型，国际形势的不明朗以及周期性经济危机也都在冲击着我国的经济发展。综合以上，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的经济发展必须做出相应调整。

让我们深入剖析一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部逻辑。首先，我们为何要选择供给侧这一抓手，原因是短时需求侧的刺激并不能是永续的，短时间内刺激消费提振经济，但也可能会导致物价飙升、资源配置失当、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等后果。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曾多次推行刺激消费的计划，但可以看到其负影响也是显著的，因此刺激内需不能成为长久之策。同时在消费市场，无论是内部市场还是外部市场，由于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可能因红利而逐步丧失比较优势，加之国际政治波谲云诡，存在诸多难以预料的因素，因此我们试图找寻供给侧的突破口。在供给侧，当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失去红利，加之发展过程中资源配置逐渐不能适应时代需求，种种过剩产能和低端供给不但不能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反而可能制约了生产力的活力；因此，有必要进行系统性的结构调整，优化资源配置，激发发展动力，以适应时代和中国新发展阶段对于经济发展的新要求。

**（二）三去一降一补——优化资源配置和制度机制**

“三去一降一补”是习近平总书记结合供给侧改革的战略布局和中国实际情况提出的。“三去”指“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一降”和“一补”分别指“降成本”和“补短板”。 “去产能”主要针对的是钢铁、石油等产能过剩行业，除此之外，还应该除去低效的落后产能。以汽车行业为例，2000年中国汽车行业有118家整车企业和1682个零部件企业，产能分散，无法形成规模经济[[7]](#footnote-7)，其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为了政绩，倾向于扶持亏损的汽车企业，使之无法依照正常程序退出市场，从而产生了大量的低效产能。除去这些过剩产能和落后产能，适当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势，有助于资源配置向更有效益的领域，从而推动经济更高效发展。

“去杠杆”，杠杆是市场中重要的经济工具之一，而由于资本的逐利性，杠杆在金融市场中可能会被非理性地运用，这一方面导致资本资源错配，另一方面，高企的杠杆会加大金融风险，对我国的金融秩序造成隐患。具体来说，由于实体产业的资本回报率低于虚拟经济和房地产行业，如果放任资本逐利，资本可能会集中涌向这些高回报率的行业，然而事实上，这些行业并不创造真实财富。从历史上看，信贷等工具是因制造业发展应运而生的，金融工具始终发挥的是配置资源的作用，其中心在于辅佐实体产业的发展。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巴西为例，巴西的去工业化和资本自由化使得脱实向虚现象日益严重，失去实体产业支撑的巴西最终陷入到了发展的陷阱之中[[8]](#footnote-8).。由此看来，要最大发挥资本的优势，应该合理应用金融工具，避免资本过度自由化而导致负外部性凸显，反而损坏良性的经济秩序。习总书记在主持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便指出:“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9]](#footnote-9)。因此，“去杠杆”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改善经济结构，优化资源配置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降成本”是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优化营商环境。事实上，降成本是对政府职能的一次调整。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要抓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成本行动各项工作，实质性降低企业负担”[[10]](#footnote-10)。民营企业赖以生存的“市场”意味着效率，而“政府”意味着维护公平和去除发展的负外部性；减轻企业负担，事实上是政府适当让渡权力，唤醒市场活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

“去库存”主要指去除高企的房产证库存，引导良性发展。“补短板”主要指在基础设施建设和与民生服务有关的服务补齐短板，扩大需求；也要求地方因地制宜优化产业结构。而凡此种种，也均是促进经济健康良性发展的重要措施。

习近平在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供给侧改革已初见成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三去一退一补’，着力化解过剩产能，推动市场出清，促进了供求平衡”[[11]](#footnote-11)，2021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继续完成‘三去一降一补’重要任务”[[12]](#footnote-12)又成为一个重要议题出现。相信随着“三去一降一补”工作的深入推进，高质量发展资源配置和制度机制会得到进一步优化，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高地**

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的讲话中强调：“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努力成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13]](#footnote-13)

进入新世纪，科技变革深刻影响家家户户的生活，也与国家经济发展紧密联系。作为生产要素之一，技术要素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从要素投入方面看，我们列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是产出，A是技术水平，L是劳动力投入，K是资本投入），并且从中可以看出，无论α+β的值为多少，边际收益递增抑或递减，技术水平的提高都会引起产出的绝对提高。无论在何时，技术进步始终是推动社会水平提供的重要引擎，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与此同时，伴随数据愈发成为要素市场配置的组成部分，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等方面的科技进步，能够更好发挥数据的正外部性和边际递增效应，不仅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还能够利用大数据技术丰富人民的生活，增加政府的监督和决策手段，在多领域享受科技变革、科技创新带来的便利。

从经济结构来看，一方面，科技创新，尤其是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信息科技催生出新高新技术产业。我们回顾几个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国家额经济发展历史，就会发现，日本与韩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均确立了“科技兴国”战略，以新兴的高端半导体等技术为主要突破口，迅速构建技术壁垒，从而大幅度提高了出口份额，获得了来自于出口这一经济引擎的不竭动力[8]。如今区块链、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仍不够充分，快速抢占这块科技领域的处女地攀登高峰，夺得一些科技领域的话语权与知识产权，就可以依靠科技拉动经济不断向前。另一方面，科技还在助力产业升级，提高原有生产力方面也发挥重要作用。例如“互联网+”技术为仓储、物流等领域注能，自动化技术简化工业生产流程提高自动生产效率；凡此种种，技术均扮演提高生产效率解放生产力的重要作用。

从社会公平角度，技术进步还有利于推动社会公平。伴随互联网等技术，千家万户均可互联，外卖平台、直播平台、网约车平台创造大量就业岗位；与此同时，精准扶贫战略也因此得益——伴随互联网成为触手可及的资源以及更多先进生产技术流入普通生产者的家庭之中，他们可以以低廉的成本生产、运输、销售自己的产品，打破贫困的现状。互联网等平台还降低了教育、医疗等社会基础资源的门槛；人民获得更普惠的教育，缓解代际固化的同时还能够提高人力资本，助力全社会比较优势的转换；互联网医疗、就业也促进了公民福利的提高。

从国家安全角度，科技创新是维护我们国家经济良序发展的重要手段。前不久中美贸易战中，美国断供一些高新技术和产品，如芯片、软件系统等，对我国互联网以及电子产品生产制造带了毁灭性的打击，相关产业发展也因此被重创。因此，拥有高端技术也就意味着高科技生产领域不会因政治等外部因素而时刻面临隐患，这一方面切实降低了生产成本，保障了生产的有序进行，另一方面提振了产业信心，有助于可持续发展。

目前，我国在科技创新方面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以专利数量来看，中国大陆的发明专利拥有量从2007年的8.4万件激增至221.3万件2007年至2020年，中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从8.4万件增长至221.3万件[[14]](#footnote-14)，然而数量上的增长并不意味着质量上的同比例提升，这一点在于中美诸多高精尖技术行业之间的对比之中便可发现。事实上，政府的政绩考核主要与专利数量挂钩，而较少估计专利质量，因此，科技创新的考查制度似乎也应作出一些调整，以促进科技创新在质与量上获得双重的飞跃。

**三、解决“不平衡发展”——从发展的负外部性说起**

**（一）“不平衡”正是发展的负外部性**

“准正,则平衡而钧权矣”。事实上，对于现有社会矛盾“不平衡的发展”这一论述中，“不平衡”很大程度上指城乡、区域、阶层等具体不平衡问题，但我想它们可以抽象为效率与公平的不平衡。市场意味着效率，而市场的发展往往会破坏公平。曼昆定义外部性为“一个人从事一种影响旁观者福利并且对这种影响不付报酬也不得报酬，这种影响就是外部性”[[15]](#footnote-15)，而当这种影响对旁观者不利，那么就是负外部性。而这种负外部性事实上就是不公平的具体体现。

市场的负外部性，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后遗症，是不胜枚举的。一种显而易见的负外部性就是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污染，除此之外还有贫富差距加大加剧社会不公以至于系统性金融危机爆发等等。而最关键的原因就在于，放任市场运作，市场会因为提高效率而忽视公平，而以上种种“后遗症”，实质上都可以归结为发展对另一些人的各种权利公平的挑战。而肩负共产主义责任的党和国家，宗旨就在于“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幸福”，因此决不能忽视任何一个人的公平权利，也因此，我们决不能忽视经济发展的负外部性。

习近平总书记高屋建瓴指出：“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16]](#footnote-16)，提出两个论断。第一个论断是说最大化发挥市场的高效特性，使得我们的经济发展获得“量”的飞跃，而第二个论断则是针对市场的负外部性，充分发挥政府职能，规避市场的不利影响，协调公平与效率，以期达到最大化平衡。因此，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我们要构建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调整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向前深入。

**（二）城乡不平衡的解决之法**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17]](#footnote-17)

我们放眼国际，拉美贫民窟现象即是城乡关系畸形发展而导致的后果。具体来说，彼时拉美国家现代化发展过快，而农业发展滞后，大量被排挤出农业生产的农民涌向城市——失业，则意味着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而不配套的福利制度又使得国家难以长久维持对这部分人的福利措施，久而久之，工业化就面临崩溃。

而结合我国的实际经验，在改革开放之前，计划经济时代，农产品被以较低的政府控制价格售出，实际上是一种牺牲农业补贴工业的做法；加之我国因为历史原因，农业人口众多；因此农业一直存在滞后的现象；改革开放后，重城市轻乡村的现象依然存在，这也产生了“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 [17]的现象。农业人口收入过低，一方面使得国内消费市场萎靡，根据边际消费倾向，财富向低收入群体的倾斜会引起内需市场极大改善，而农业等低收入人群过低收入则会造成消费不振；另一方面，城市富乡村穷并不是共同富裕，我们的共同富裕并不是要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换取另一部分人的富裕，因此，以城市反哺乡村是我们党、我们坚持的社会主义对我们的要求。

农业农村现代化紧抓三农工作、城乡融合发展、健全农业社会化体系、打好脱贫攻坚战……这些是党结合实际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提出的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党对于乡村振兴的二十字总要求，为乡村振兴提供总规划设计。乡村振兴系挂着亿万农民的生活，也是脱贫攻坚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因此回答好这个问题，对于我们解决发展不平衡，实现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三）区域不平衡的破局之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发展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我们必须适应新形势，谋划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思路”[[18]](#footnote-18)改革开放以来，区域间发展不协调的局面也较为突触。当南方珠三角、长三角、粤港澳经济带欣欣向荣之时，北方，尤其是西北地区发展很不充分，东北地区经济结构也落后于新时代的发展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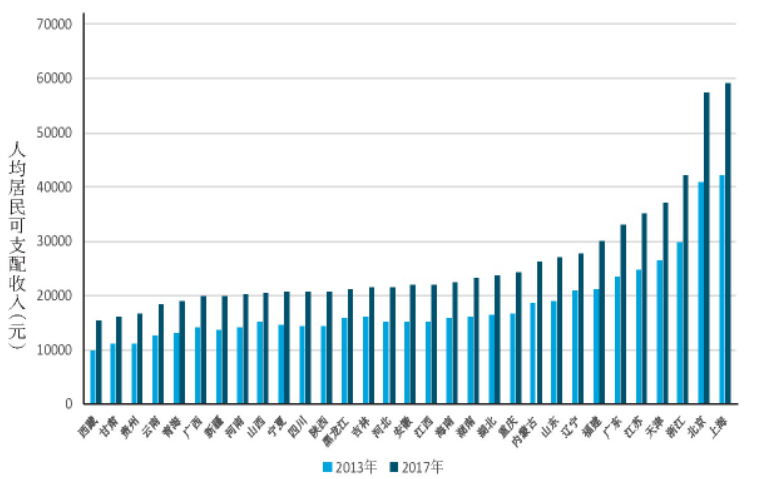


图2：各省、市、自治区2013年、2017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比图[[19]](#footnote-19)

从图2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地域间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差异巨大，而且2013-2017年四年间的增长速度也有着巨大的差距，地域间发展不平衡现象显著。这一方面与计划经济时代北方重工业基础雄厚如今新时代新旧动能转换不畅，而南方具有后发优势与地理区位优势有关；另一方面，集聚效应使得强者越强，南方的发展增速，而北方资源虽丰富但分布零散，未形成集聚规模，因此发展速度较为迟缓。

首先要明确地域定位，发挥地域比较优势，综合考虑各个地区要素资源，因地制宜发展适合地理区位的优势产业；其次，集中更多生产要素资源和政策倾斜，帮助欠发达地区建立符合定位预期的优势产业；再次，发展应当适当顺应市场规律，盲目建立并扶植过多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行业可能会在低效发展的同时由于摩擦消耗政府财力；然后，可以建立城市群间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通过利用要素比较优势分担较发达城市的一些职能，在纾解大城市压力的同时还可以由点到面带动整个区域的协调发展；最后，应当完善地方政绩考核标准和相关制度，由于我国的官员任免制度如此，官员在一地留任时间并不会很长，因此应避免政绩考察过度与发展数量挂钩而忽视发展的可持久性与发展质量。

**（四）解决破坏生态的负外部性**

2018年，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发言指出：“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五位一体’，这是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更带来了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的深刻转变”[[20]](#footnote-20)。根据这一论述，生态文明建设本身就是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

事实上，经济发展的负外部性很大一部分来源于环境污染。我们回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历史，以英国为例，工业化煤烟造成的大气污染使18世纪伦敦出现25次毒雾事件，在个别年份死于支气管炎的人数比正常年份高出将近200%；河流污染使得1831年霍乱瘟疫夺去两万余人生命；与此同时，基础设施和卫生设施的匮乏使得部分城市阶层平均寿命只有二十余岁[[21]](#footnote-21)，这些一方面阻碍了城市化、工业化进程，更重要的是，如此的发展违背了以人为中心的发展初衷，失序的发展反而成为了戕害人民的元凶。

而伴随着发展不断进行，我国在环境治理方面的问题暴露愈发明显：“中国最大500个城市中，只有不到1%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空气质量标准”[[22]](#footnote-22)，而经过近十年的治理，我们的生态环境保护有了显著改善，然而仍与生态文明建设的预期有一定距离。根据《2020年全球环境绩效指数报告（EPI）》，我国以37.3的得分位列参评的180个国家地区的第120位[[23]](#footnote-23)。因此，生态文明建设仍任重道远。

从工业主体角度，讲求开源节流。一方面开源，持续助力环保新能源的开发与利用，参考发达国家发展规划和发展路径，推进建设清洁风能、光能、水能、生物质能等新型环保能源等；另一方面节流，关注重点污染行业的转型，利用创新技术升级传统高污染工业流程，减少工业污染排放。

从政府部门角度，建立健全合理配套设施。一方面管；另一方面适度管，切不可盲目追求生态政绩而忽视经济发展，以至于本末倒置损害人民利益。政府要发挥引导职能，通过协助产业升级，促进技术要素流通等手段，因地制宜，渐进式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从公众参与角度，可以参考芬兰等环境治理杰出的国家学习先进经验。芬兰的公众参与是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组成成分，在信息公开和社会监督渠道畅通的情况下，每个公民都可以通过公开的信息以及新闻媒体的报道参与到环境治理与监督之中来；与此同时，健全的司法体系也使得公众有途径对抗于环境污染行为。因此，我国可以在生态文明方面提高信息透明度并完善配套法律体系，充分发挥人民治理的优势。

**四、结语**

回顾本篇文章，我们先从“质”和“量”两个维度诠释了“高质量发展”的含义，“高质量发展”实际上是党和国家实现人民美好愿景的必由之路，“质”和“量”二者均不可偏废。之后，我们又指“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现象是“高质量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而解决问题之道正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负外部性的消除。

相信我们解决好“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问题，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就有了回答好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的信心，也就有了把前无古人的事业推向前进的自信与勇气。

徐浩博

2022年5月26日于清华园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238页。 [↑](#footnote-ref-1)
2. 参见代法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理论、经验和对策——基于44个国家的跨国实证分析》，《财经研究》2014年第2期。 [↑](#footnote-ref-2)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9页。 [↑](#footnote-ref-3)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7页。 [↑](#footnote-ref-4)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2页。 [↑](#footnote-ref-5)
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17页。 [↑](#footnote-ref-6)
7. 参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最不怕开放：家电和汽车成败启示》，2020年4月21日，https://www.chinathinktanks.org.cn/content/detail/id/orxoe960，2022年5月26日。 [↑](#footnote-ref-7)
8. 参见郑秉文：《“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发展道路——基于国际经验教训的视角》，中国人口科学》2011年第1期。 [↑](#footnote-ref-8)
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240页。 [↑](#footnote-ref-9)
1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264页。 [↑](#footnote-ref-10)
1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252页。 [↑](#footnote-ref-11)
12. 《政府工作报告——2021年3月5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2021年3月12日，http://www.gov.cn/premier/2021-03/12/content\_5592671.htm，2022年5月26日。 [↑](#footnote-ref-12)
1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245页。 [↑](#footnote-ref-13)
14. 参见邱楚芝、赵锦瑜：《中国企业创新为何重数量而轻质量——数量增长目标考核视角》，《南方经济》2022年第5期。 [↑](#footnote-ref-14)
15. 〔美〕曼昆：《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分册》第7版，第211页。 [↑](#footnote-ref-15)
1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234页。 [↑](#footnote-ref-16)
1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255-256页。 [↑](#footnote-ref-17)
1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270页。 [↑](#footnote-ref-18)
19. 参见孙志燕、侯永志：《对我国区域不平衡发展的多视角观察和政策应对》，《管理世界》2019年第8期。 [↑](#footnote-ref-19)
2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359页。 [↑](#footnote-ref-20)
21. 参见刘金源：《工业化时期英国城市环境问题及其成因》，《史学月刊》2006年第10期。 [↑](#footnote-ref-21)
22. 参见张庆丰、〔美〕克鲁克斯：《迈向环境可持续的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分析》，第46页。 [↑](#footnote-ref-22)
23. 参见WENDLING Z A，EMERSON J W，DE SHERBININ A et al：“2020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dex”，22 Jan 2021，https://epi.yale.edu/epi-results/2020/component/epi，26 May 2022. [↑](#footnote-ref-23)